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第二版)

ERSHI SHIJI ZHONGGUO FANYI SIXIANGSHI

王秉钦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20 世纪 中国翻译思想史

(第二版)

王秉欽 著

南开大學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 王秉钦著. —2版.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8.7
(南开百年学术文库)
ISBN 978-7-310-05582-1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思想史—中国—20世纪 IV. ①H0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988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7月第2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230×155毫米 16开本 27印张 7插页 313千字

定价: 139.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王秉钦，1935年生，天津宁河人。1959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历任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翻译博士点专家、国家教育部翻译学科通讯评审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政协天津市委员等。主要著作有：《文化翻译学》《对比语义学与翻译》（教育部“八五”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汉英俄外经外贸词典》（主编）《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副主编）《新世纪汉俄大词典》（审稿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等。主要译著（含合译）有：《崇高的心灵》《夜幕中的闪光》《果戈理传》《社会主义和科学》《苏联科学院简史》《苏联历史档案文献》（40卷本，审校者）等。文学创作有《路漫漫》（香港凌天出版社）。发表有关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学术论文及文章逾百篇。

〔严复译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山而面海。极处诸境，乃乃如生想二千年前，古罗马大将恺撒未至，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其俗如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才陀起伏间。而灌木林丛林，葳茸，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据，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常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虫惟悴孤虚，旋生旋灭，荣枯顷刻。是密密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天地之间，战争如然，强者后亡，

谨以此书献给南开大学百年华诞

(1919 ~ 2019)

轻轻拂去岁月的尘埃，
让历史的光荣与缔造在今天重新焕发光芒。
2019年，
南开迎来了百年华诞。

前 言

正值南开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本书以“自选集”之形式，纳入“南开百年学术文库”，实乃光荣之至。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是一部系统而简要论述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著作，其性质类同于史略或简史。

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以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贯穿中国 20 世纪百年翻译思想史发展主线。全书分上、下篇，上篇为“传统篇”，即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首次划分并论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转折、发展、鼎盛四个时期，以“十大学说思想”为中心命题，追溯其共同的历史渊源，继承、发扬、开拓传统译论思想；下篇为“现代篇”，即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重点论述中西翻译思想“融合期”、翻译学科全面“建设期”和当代中国翻译思想“调整期”。在论述中，更多的关注新时期的新译论、新观念、新思想，以及中国当代翻译思想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本书以不同的学术史观和研究方法，以大特写的视角，以简练的写作方式，浓缩了数十位古今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之精华，再现了 20 世纪百年中华译学之异彩。书中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有历久鲜活的人生（翻译）经验。诚如一句名言：“读了它，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本书只是文库中之一种，文库而外，尚有百年来南开大师

们的经典之作。作为学术传人，曾以笔耕不辍自勉，同时也由衷向先师们的经典致敬！

王秉钦

2018 年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

（再版自序）

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是贯穿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写翻译史难，写翻译思想史更难。我深知，治学首在明道。治学的大道，是继续前贤未竟之业，聚沙积薪，继长增高，所谓泽积而长，山积而高，正如站在巨人肩膀上，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1676年牛顿写给胡克的信）做学问不可存心以立异为捷径，一味读前人未见之书，治前人不治之学，这样恰如盲人骑瞎马行险道，极易偏离正道常轨。本书正是继续前贤未竟之业，在翻译思想史研究领域做了一些铺路奠基的基础性工作。

一、聚焦翻译宗师：翻译大师是一座高山

历史的中心是人，翻译思想史的中心也是人，是翻译大师。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多为各自领域出类拔萃者。历史上能够披沙拣金留下来的人物大都天赋异禀，功力深湛，体大思精，见

高识远，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加上时空距离遥远，身份差若天渊，研究者大都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难以体察其行为心境。一位大学者，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就是一片深藏若虚的海洋。研究者能否领悟到他们在翻译上那些真知灼见背后跃动的创造灵感，能否把握住学者的人生情怀及其所处时代的个性特点，并作出自己的客观的描述与阐发？

依稀记得，意大利著名美学大师克罗齐有句名言：“要了解但丁，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克罗齐《美学原理》）要了解和评述译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则无疑应该需要有与其大致相当的学术根基，然而吾辈后学，与这些大师们在学养上的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因此，要完成此书谈何容易？况且，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钱锺书《谈交友》）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此话极有见地。研究者非得下一番精思明辨的学理功夫不可，沉潜书海，寻觅“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思想火花，与大师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进行神交。学问之事，要求天赋、勤奋和机缘，三者缺一不可。吾辈自知才疏学浅，只求以勤补拙，尽全力而为之，以达与古今智者贤人心灵上的沟通。

当然，我还深知，对每位大师们卷帙浩繁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还有许多的空白点，这就会使本书留下无法避免的缺憾。只有留给那些占有资料更为详备丰富且用功甚勤的年轻学者，来填补这些空白点吧。

鄙人写学术思想史，还有一好，好将学者生平与其学术思想分离开来，好以今人观念揣度解释古人思想。依我之见，此法也不失为一良法。梁启超曾说过：“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

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当然，吾辈学习运用，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还要温故知新，先因后创，守成有余，方能继以创新。

二、梳理译论长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 需要“学派”的力量

翻译思想史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本书在修订过程中，随着阅读渐广，思考益深，我越来越感到，原来的研究项目框架似乎已不能完全涵盖和容纳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范围，要对这个项目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描述，反映出它的绚丽多姿，非有足够的容量空间和时间不行，非个人能力所能胜任，研究领域只有相对集中，论述才能更加深入。此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本书再版正值南开大学 90 周年华诞，同时也是本人在南开大学执教 50 个春秋。

这使我想起了与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南开翻译学派”，因此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南开翻译学派”是“西南联大翻译学派”的支系，是中国主要翻译流派之一。

引导吾辈走上翻译之路的引路人李霁野先生主持南开外语学科期间，以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著

名翻译家，如查良铮（穆旦）、金隄、高殿森、李宜燮、周基堃、臧传真等，论其翻译理论和翻译风格，论其学术实力和在国内译界的学术影响，已形成了“南开翻译学派”的第二代核心。

南开翻译学派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是柳无忌（柳亚子之子）、梁宗岱、卞之琳、罗大冈。这一翻译学派，数十年来，在大师们的精心培育下，代代相传，后继有人。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中青年教师中涌现出了一批有学术个性的英、俄、日语种的翻译学者，并于 90 年代在英语专业设立了招收文学翻译博士生的博士点。这一切标示着南开外语的兴旺发达，也可以说是以李霁野等前辈翻译家为核心的“南开翻译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一种延续（关于“南开翻译学派”，另有专论）。

学说是科学的精华，学派是人才的精华。

科学学派就是一个智力的系统、一个人才的系统、一个科学的自组织系统。共同的学术观点、共同的思想方法、共同的科学理想把一群翻译家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所谓的“无形的学院”（普赖斯语）。翻译流派不是一个“组织概念”，而是一个“理念概念”。有了关于翻译的正确的相同的基本理念或主张，就必然会形成翻译的流派。这对于那些需要长时期研究才能完成而又非个体研究所能胜任的巨大科研课题，显得异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集团效应”。

当然，这个系统往往拥有一个既有高深的科学素养，又富于科学的组织才能的“帅才”人物，作为学术带头人，像古代的墨翟和毕达哥拉斯，近代的牛顿和李比希，现代的玻尔和冯·卡门，等等。在他们周围往往云集一大批有才华的学者，为着一个共同的科学理想而奋斗。像以哥本哈根精神为旗帜的玻尔量子论学派，就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年轻物理学家。1922 年至 1932 年十年间，这个学派先后有十个人荣获诺

贝尔奖金。

自然科学研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亦然。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依然需要“学派”的力量，需要“集团效应”！

三、梳理译论长轴：深入探索中国现代翻译思想

我们在梳理译论长轴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梳理，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坚持以忠实原文为准则，以文本为中心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翻译思想是正确之路。而对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研究则尚未达成共识，翻译界有识之士正在积极探索。在现代翻译思想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翻译大家钱锺书、朱光潜、王佐良、季羨林、许渊冲等人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现代翻译观念，可以说，它们都是现代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颇值得深入研究。约略言之，可有以下诸端。

（一）“灵魂转生”说

钱锺书写道：19世纪末，德国最大的希腊学家维拉莫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在一部悲剧《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①（Euripides: Hippolytus）译本的开头，就说过“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将古希腊语原著里

^① 相传，希波吕托斯是雅典国王忒修斯和安提俄珀（一说是希波吕忒）的儿子。他的后母淮德拉狂热地追求他。遭到拒绝后，她怀恨在心，在他父亲面前极力诬陷他，他父亲听信谗言便请海神波塞冬来惩罚他。当希波吕托斯乘马车沿着海岸奔驰时，突然海神波塞冬打发一头牛出海吓唬拉车的马匹，于是马惊车覆，这少年当场毙命。后来，能起死回生的神医阿斯克勒庇俄斯把他救活，并把带他到意大利。他用维耳比乌斯的名字开始新的生活，成为意大利英雄。在雅典，人们对他敬奉如神。关于希波吕托斯的神话一直是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塞内加的悲剧创作题材，在现代则成为拉辛的悲剧和拉莫的歌剧的内容。这段神话故事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生”的含义。

的实质换上了德语译本的外形。他所用的比喻“灵魂转生”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它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含义。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小说里所讲的投胎转世和借尸还魂的故事，无奇不有。这种“躯体虽异，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翻译，就是“灵魂转生”。

诗人翻译家余光中也表述过同样的思想。他说：“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直译，甚至硬译，死译，充其量只能成为剥制的标本：一根羽毛也不少，可惜是一只死鸟，徒有形貌，没有飞翔。”

“灵魂转生”说，外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内在生命对应”。别林斯基在《哈姆莱特·瑞典人的原则》一文中写道：“为了忠实地传达某一形象或语句，在翻译中无论是形象的对应，还是语句的对应，都永远不是字面的对应：应该使译文的内在生命对应于原作的内在生命。”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名言，译者所应当追求的，“宁愿是只活的麻雀，而不是只死鹰”。庞德称诗歌翻译就像“给鬼魂注入血液”，译诗就是“让死人复活”，使优秀的文学传统再生，是一种“文学复兴”。

“灵魂转生”说与西方解构主义者宣称原作者“死亡”，翻译是文本的“重生”，“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并获得新的生命”说法，似乎是完全一致的。

（二）“译者个性”说

近百年来，我国传统翻译观念一直认为，翻译就是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要把原作的內容确切地完全表达出来，无改变或歪曲的现象，无增添或删削的现象，无遗漏或阉割的现象。”这就是说，由于翻译受制于原文，就必须泯灭译者的主体意识，否定译者的创造个性。一句话，译者应充当“隐形人”，彻底“隐身”，要做到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完全忽略

了译者客观存在的介入行为。

然而，“文学和艺术作品毕竟不是科学，而是触及‘灵魂’的东西，这里面有‘朦胧’和‘似与不似之间’的成分，要用像数学那样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个‘再解释’的过程。译者在‘揣度’的过程中，就受到他本人的人生修养、文化和政治水平、艺术欣赏趣味以及他对作者及其时代背景的知识等因素的限制。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翻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叶君健《翻译也要出“精品”》）。

叶君健特别强调“译者的个性”作用和创造“个性的译作”的思想。特别是在他晚年，这一翻译思想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他说：“单凭‘信、达、雅’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具有个性的译作。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有个性。”“一部译作有没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译者有没有个性。”“一部有‘个性的译作’是译者的心血、思想感情、文字和艺术修养的总和。”从而创造了“译者个性”说。

过去，在传统翻译观念，即“信、达、雅”翻译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对“译者个性”是翻译作品生命的思想，缺乏深刻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禁锢的表现。翻译研究需要解放思想，需要不断接受新的观念。

（三）“从心所欲，不逾矩”新解

“从心所欲，不逾矩”原本是孔子《论语·为政》中一句名言。今天翻译家们把孔子论说人生的规律运用于翻译艺术领域，认为它体现了翻译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全过程，准确地诠释了翻译的哲学实质。

翻译大师钱锺书、朱光潜、许渊冲在其著作中曾反复引用并论述孔子这一思想对艺术和翻译的重要意义。朱光潜说：“‘从

心所欲，不逾矩’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因为文学翻译也是一门艺术。记得德国有一句古老的名言：“逐词时尽量逐词，自由时尽管自由。”译者要达到这种自由的艺术境界，完全取决于其高深的文学素养和深厚的语言功力，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情，以及丰富的翻译实践。搞文学翻译不追求境界，只追求“术”与“道”是远远不够的。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术”和“道”上做文章，当然，这些努力应该说都是必须的，都是为了“不逾矩”，为了在“不逾矩”的前提下，走进“从心所欲”的境界。

（四）“文化中心转移”说

季羨林在晚年，一直关注和研究东西方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他写道：“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 21 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其理由是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

西方人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季羨林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必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

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 21 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 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我们希冀大师的预言必将变成现实。

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也必将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不再单纯追求分析的道路（比如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以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等词对词、句对句的机械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例），而去寻求整体的综合的东方文化之路，迎接中国翻译界的科学的春天。

作者

2009 年春于北京